

素手青条上 红妆白日鲜

——地域、女性双重视阈中的胡辛作品研究

何 静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对作品进行研究是一个虽古老又常新的论题。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1934年4月19日鲁迅先生在《致陈烟桥》信中明确指出:“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在江西,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自1983年以《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来,28年笔耕不辍,涉小说、传记、散文随笔、理论研究等多种形式,又拓展影视疆域,凝聚成800余万字墨香纸质文本、编导17部94集情意脉脉的影像作品。她不仅较早地用小说文体和女性视角审视女性生存状态,而且对生她养她的一方厚土的挚情激情喷薄,“实现了

她曾经许下的真诚的诺言:为这方水土这方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像”,她,就是被评论界称为“红土地的女儿”的胡辛。

在流变中守恒,她与她的作品始终有着特立独行的风姿。其文风清丽婉约中不乏率真英武之气,内容大多聚焦于两座城市和一方乡野,那就是省城南昌、瓷都景德镇和江西苏区。胡辛关乎女人的命运,更将女性的生命体验与地域、历史镶嵌交织。流逝岁月中的女性形象无不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烙印和清晰的时代标签。《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彰显出胡辛朦胧的女性意识和古城南昌情结,而一场《蔷薇雨》让满怀的女性意识与乡土情怀这二元视野交错交融色彩缤纷。红土地情结尽现于《我的奶娘》、

对人间男女情感的本质,有着不留情面的透彻,即便红颜老去,爱心依旧,纯真的本质依旧。作者借由瓷器之美来弥补女人现实中的无力处境,也有自我勉励之意。

蔷薇、陶瓷,它们是美丽的自然之物,在小说中经由作者经验的综合、转位和女性视角的暗示,赋予其社会属性,使之情感化、拟人化,从而与女性实际生活的心情感应,与女性生命状态的呈现暗通,并寄予女人的未来许多希望,遂自视觉的单调意象升入感官与性灵的复叠意象,成了最动人的自然之物。它们在作家的艺术自觉下,通过文字的经营,成为一种隐喻,蕴含着作家观看人世的讯息。胡辛面对这些物象,深耕文字的犁耙,开出一方充满诗意的田圃,建构起了由作者和读者共同组成的心灵共同体。她把握着的是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最高意义。

五

胡辛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江西自现代以来文学成就最突出的

女作家。她由《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发轫,从追求女性为社会承认的“理想”价值,到《蔷薇雨》呼唤女性的内在自觉,再到《怀念瓷香》重构自身历史的母性书写,其小说创作的清晰流变可谓代表了女性写作的三个阶段。她年近四十才开始文学创作,纵横文坛近三十年,凝注其热血,坚忍其意志,勤勤恳恳,以笔为锄,持续耕耘,为自身、为女性、为人世,耕耘一片丰畴沃野——既无愧于文学的庄严,亦无愧于艺术的崇高,实为人格与风格之合一。她的小说见证了一个学者型作家艺术创造的品质和智慧,使人们看到:一方水土和一方女人有着隐秘的生命关联,一种具有持久魅力的写作,往往是经由自身丰富的生命感悟而朝向地域与传统的一次精神扎根。她的小说既淡也浓,时而端庄如成年者,忽而又纯真简单如孩童,行年四十如柳青、如徐希玮、如树青,理性、知性、独立、强韧、热情而敏感、倔强而脆弱,她们总是走在返乡的途中,寻找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自我”,而那亘古的爱呵,是她不变的信仰,即令必然如花如瓷,也依旧会兀自绽放的……

《粘满红壤的脚印》、《情到深处》，而《瓷城一条街》、《地上有个黑太阳》、《瓷都景德镇》、《瓷都名流》、《怀念瓷香》亦将白色土化为心有千千结！正是：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可以说，她的艺术情怀和创作视野就是在赣鄱地域文化中寻找女性，在女性精神世界中呈现故土家园，女性意识与地域文化和谐完美水乳交融统一在她的文本世界中。

一、香樟古郡中的绿色人生

审视胡辛的作品，人杰地灵的古都南昌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城市。创作于1983年暮春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部不短的短篇负重若轻，以南昌为背景，承载了四个本地女子的故事。“省妇女保健院，出门就是繁荣的大道（八一大道），隔壁就是高矗的百货大楼，横过马路就是热闹的工人文化宫”；“系马桩前无马系，桃花巷内没花香，松柏巷口不见松，只有干家巷内似乎还住着干氏大家族，但这些与她们有什么相干呢？”“这些描写准确的程度简直可以当作从未到过南昌的人的导游图。”而王蒙先生如是评价长篇小说《蔷薇雨》：“六眼井、三眼井、大井头、灌婴的洗马池、乾隆题过匾额的干家大屋、东汉高士徐孺子的故居……栩栩如生，充满着地方特色、民俗风情、历史积淀与时代的新貌。”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从乡村女教师柳青、赣剧演员钱叶芸、助产士魏玲玲和区妇联干部蔡淑华成长的单纯似可感触到这方水土教育之浓厚氛围，分别二十年后邂逅中四女对事业、家庭、爱情的种种慨叹，评论者多界定为新时期较早出现的对女性独立价值的追寻和徘徊，但说到底，却还是儒家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的古老奋斗目标，只不过身为女性的小知识分子要达标，在男性知识分子遭遇的种种艰难险阻之外，还要加上来自男性的性别压迫和歧视。而在原本是四人中的圆心儿，眼下却身患绝症的乡村教师柳青身上，她豁达开朗弃名利之胸襟，我们似透视出作者赋予她追求大爱大自由的安隐心海，用儒家“立德、立业、立功”来衡量，她只是平凡人物平凡事，也不完全等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蕴藏了作者较复杂的人生感悟。

长篇小说《蔷薇雨》从大构架来看是中国传统小说常见的家族故事，但作者刻意将故事安排在东汉隐士徐孺子的后裔家中。“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但隐逸文化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还有立足之地吗？在传统观念的急遽嬗变的诱惑和撞击下，还能安放一片安静的心海吗？作者试图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表现自己的忧虑和思考。徐家书屋的七姐妹与古

巷的女人们，彷徨、躁动、拼搏和激进决不亚于世界另一半的男人们。理性与情欲的撕掇、人格与本能的抗衡、灵魂与肉体的崩裂，在女人的心田迸发种种律动和骚动。变，终归是好事，是前进着的；海，到底是浩瀚的，气象万千的。可下了海的，并不全是主动的躁动的奋进的；人生的路，各种外力和内驱组合着扭绞着，命运并不操纵在你自己的手中！千百年的知识者的心理积淀，就会一风吹去无影无踪么？在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的人流中，是否还有甘于清贫、甘于淡泊的寂寞的精神田园？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论争、保守与激进的抉择、守旧与创新的权衡纠结，更是集中聚焦在都市女性的身上。

“作者不仅对故里红城的物质文化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而且对故里红城的精神文化进行了颇有力度艺术表现。”我们看到，作者选择都市转型期思想矛盾为切入口，以都市的女性意识变迁来把握独特而丰富的女性体验内涵，借助叙事努力将这一切发掘出来，从而在小说中建构一个特色鲜明的都市背景下的女性世界。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作者达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因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赣地城市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民俗世象，更看到这片土地上女性的情感与心理。作家对女性精神家园和地域文化的坚守和超越，为王蒙先生评论所言：“那种真实的生活气息，真实的艰难和痛苦，那种历尽艰难仍然真实、仍然活跃着的一颗颗追求理想、挚爱而决不嫌弃生活的心感动了我。”

二、回望中不灭的红色情结

江西南昌，打响了中国革命武装起义第一枪，井冈山被喻为革命摇篮，瑞金是第一个红色政权创建地，于都河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江西地域特色烙刻进红色，神圣、圣洁。江西地域积淀而成的文化底蕴穿越历史的时空，固执地穿行于当代生活之中，内化在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况且，王愿坚的小说《党费》和改编成的电影《党的女儿》等是胡辛成长的精神食粮，成名后的她对这方热土不变的“红色情结”的展示特征是：用女性细腻的笔触发掘英雄背后的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苏区妇女们，以期将她们补写进历史的页岩。

《我的奶娘》是胡辛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的一家于抗战时从南昌逃难到赣南，先居赣州，再辗转到瑞金、宁都。作者的奶娘就是瑞金沙洲坝的一位雇农妇女。这位纯朴、善良的山里奶娘“哺育”后代的故事娓娓道来，既是对历史的回忆故事，也是女孩成长的故事，或者说借女孩成长的线索来写历史书页字里行间

被隐去的女性的故事。“我的奶娘”曾是红军的妻子，丈夫长征后音信隔绝；在“奶娘”家养伤的女红军生下了儿子石丹，女红军为保护百姓挺身而出英勇牺牲；“奶娘”为保护烈士遗孤石丹，失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了生存，“奶娘”改嫁善良的老郎中，被迫喂养伪团长家的少爷，伪团长发现蛛丝马迹后，老郎中被害，奶娘带着石丹死里逃生。为了活下去，奶娘再改嫁一老年“痞子”，并成了书香门第的“我”的奶娘！历经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乱，解放后，奶娘却被定为坏分子家属，与已当大官的前夫相见，惟有泪千行。历经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饥荒及“文革”劫难，奶娘的善良和坚韧不变，无怨无悔，庇护了她奶大的几个不同阶级、不同血缘的后代，包括伪团长的儿子！

“我的奶娘”与小说《党费》(1954)中的女党员黄新及改编成电影《党的女儿》(1958)中的玉梅相同，但同中有异。她们同是苏区妇女，身上都有着苏区妇女为了革命坚忍不拔、默默奉献、不畏牺牲的高贵品质，不同的是，黄新、玉梅是党的人，为党的事业英勇献身的壮烈行径撼人心魄、感天动地！她们寻找党组织的经历虽坎坷曲折，但她们的内心世界很单纯，没有复杂性；而奶娘只是红军家属，苏区极普通的女性，她的经历坎坷曲折，两次改嫁，其内心世界是复杂矛盾的，世俗社会对她的定位和评价亦是复杂难辨的，当然，一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对老区妇女的挚爱与崇敬，犹如绵绵细雨，浸淫在胡辛的多部作品中。小说《蔷薇雨》里的糯糍女，在赣南游击战中，用奶汁救活了身负重伤的凌光明；几十年后，又是她给走投无路的阿玮母子一个遮风避雨的窝！这位革命老妈妈给人却只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尚未实现温饱的山村苦老太婆的形象”。苏区的妇女为革命付出了多大代价忍受了多少痛苦煎熬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等量报答！凌光明在弥留之际的糯糍女面前，已然不认识她了，只是她手腕上的苦竹手镯，怦然撞开了记忆之门——那是他伤痊愈后亲手雕刻给她的手镯呵。凌光明怎能不怀着深深的愧疚？而在阿玮的眼里：“她只知糯糍婆婆是她的救命恩人，却不知她是革命老妈妈！糯糍婆婆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可记载？有多少坎坷悲壮的经历可抒写？抑或有过被怀疑的冤屈被抛弃的不平？抑或真的有过沉沦有过一念之差？她不知道。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只是觉得她自己是世上最苦最不幸的女人，她从来没想到应该了解理解朝夕共处 18 年的山村老婆婆！糯糍婆婆给她说过很多不连贯的或悲或壮的别人的故事，或许那就是糯糍婆婆自己的故事？她不知道！人死而方为世人所知！糯

糍婆婆死了世人也不尽知。”在同名电视剧《蔷薇雨》中，糯糍女改名为苦竹女，是一个始终没有出场的人物。退位并重病的凌光明回首往事，一定要找到当年救过她的苦竹女，当然，他最后见到的只是青山深处的坟墓！

有论者说“尽管她没有从正面去描述红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场面，但在《我的奶娘》、《情到深处》中隐隐约约流露出她对这块红土地的思考，奶娘、红婢、糯糍女、二小姐，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折射出‘红嫂’的光辉。”确实，这些红土地上的女性，她们的性格中既有沉静和抗争的忧伤，也有坚贞和决绝的纯粹，更有厚道与自然的淳朴，性格内核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赋予了她们独有的魅力，她们以多姿的气质与醇美的品格凸显了江西地域女性独具的地缘精神。

三、触摸中永恒的白色情怀

美国著名女性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同样，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也不能随意选择他们的审美对象，他们的选择必须依赖于审美激动的实现。在胡辛的视阈中，陶瓷承担了这种介入、统一功能。《地上有个黑太阳》、《陶瓷物语》等瓷都家族故事，其千年窑火的大文化背景，使其拥有了久远的历史时间感和源远流长的文化纵深感。景德镇的窑火其实何止千年？古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春秋。至于陶瓷史“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御窑皇家瓷、湖田窑的民间青花、罗汉肚的柴窑，有多少文章可做？千年陶瓷历史的探究和追溯是对历史进行史诗化的别样言说，为景德镇的故事平添几分神秘色彩。

胡辛正是怀着迷惘却执著的情感，在默默无言的白色土上，持久地书写她的白色情怀。作为 1967 届的大学毕业生，她分配到景德镇，一呆 8 年，自言“一个女人最美好的黄金岁月就攒在了那里”，她称景德镇为她的第二故乡。《昌江情》中汨汨流淌的母亲河——昌江，见证了浣衣妇母亲对儿子的默默的奉献和爱，母亲在儿子功成名就后仍坚持在江边浣衣，这让儿子不解和烦恼，可是，当高大的儿子在刹那间明白过来，抱住江边浣衣的矮小的母亲，并把她“举”了起来时，这伟大的瞬间承载了怎样的母子情！《禾草老倌》中禾草包装瓷器的被淘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情感的悲剧，禾草仿佛将炼瓷的古镇与种田的农村紧紧相连，这一割弃，让景德镇人有了太多的感喟。《“百极碎”启

嫁接的艺术与艺术的嫁接

——文学与影视双重视阈下的胡辛创作研究

王小娥

在传统与现代、恪守与流变、牴牾与狂欢冲撞交汇的转型时代中,不少作家从埋头纸质文本中走出,“抛头露面”于影视立体传媒,从个性而为的小说到面向大众的影视剧,激流勇进中女作家群体亦呈巾帼不让须眉之势。王安忆、池莉、王晓玉、张欣等皆或深或浅地裹挟于小说的影视改编潮中。其实,在江西这片有点

儿寂寞的红土地上,早有一位女作家,于1980年代初便弄潮于文学与影视双向互动的激流中,淡定从容,奇迹不断。她,就是江西籍的著名作家胡辛教授。

1983年,38岁的胡辛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即被上海和广西电影制片厂分别改编成电视剧和电

示录》将人对生命不无缺憾的感悟烧炼进瓷里;《瓷城一条街》是“名副其实”又“徒有虚名”的瓷器街的新风俗人情图,景兴厂长在新女性谷子和残疾女子之间的两难选择的故事,京城记者与谷子的“罗马假日”般的浪漫故事,丹青世家傅野鹤和儿子小野间的无法沟通的代沟故事,谷子和研究古陶瓷的父亲田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故事,景兴和以禾草包装瓷器的父亲“无言以对”的故事,柴窑把桩火师傅与青青母亲香姆妈的纯清的黄昏恋的故事,爱管闲事的居委会代表粑粑头胖姨娘的故事……在胡辛笔下,绘声绘色、意味无穷却又都分明食着人间烟火;《地上有个黑太阳》中白色土情怀溢于言表,但隐晦曲折的家族之谜,加上魔幻玄乎色彩,给景德镇的故事平添许多神秘幽深艰涩的气氛。

21世纪初期推出的长篇小说《陶瓷物语》,既是对陶瓷历史之河的几番溯源而上的追述,更是陶瓷的时间之河对人的淘洗,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沉甸甸的景德镇的史诗。该书扉页题写:“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这是一部融汇陶瓷历史和陶瓷技艺的书,源远流长的中国陶瓷文化历史的沉寂与当代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浮躁故事形成强烈的反差,却又浓得化不开。故事的主角是人,而“物语”却为小说增添奇幻色彩。女作家侯秀芬曾赞叹胡辛说:“对瓷的女性解读,认同瓷这一中国文化的母体为女性,不能不说是她的文化底蕴十足又慧眼独具

的凸显,是否可以说,这可能是关于华夏文明的另一种追溯呢?自母权制被颠覆后,女性湮没于历史地心深处,女性何时才能浮出历史地表?在女性苍茫又荒凉的历史长河中,瓷是女性顽强坚韧的生存状态、细腻委婉又炽烈喷薄的情感舞蹈的记载、折射和象征。无论对否,她勇敢又潇洒地参与了当代文化建构。”一个个瓷背后的故事让人痛惜,情感如瓷,是很难经得起碰撞的。胡辛就这样用女人的眼睛女人的心去触摸、去感悟瓷与女人,从瓷的破碎中分明传递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的女性特质的呼喊。

地域文化特质沉淀为胡辛作品的原始底色,而独立的女性意识由朦胧渐清晰浸淫其间,犹如香樟,于朴实无华中沁出淡淡芬芳。当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领导问由胡辛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蔷薇雨》的立意时,她的回答是: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我们轻易抛却的,也许是我们,甚至我们以后的几代人所要苦苦寻求的呢。这是一个普适性的结论,但她的思考萌生于这方水土。在胡辛的作品中,作者的自我形象始终是一个冷静的洞察反思者、一个充满悲悯情怀的人文知识者、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她站在爱与痛的边缘,埋头于对道义与承担的守望与超越,尽情演绎着对这方水土这方人的呵护与拥抱、批判与礼赞。